概　　论

湘鄂西根据地货币，诞生在根据地创建之初，成长在热火朝天的土地革命斗争和战火连绵的军事斗争中，它伴随着根据地政治、军事、经济斗争而发生、发展，伴随根据地的丧失而消亡，它象一面镜子，折射出我党领导湘鄂西人民顽强奋斗的光辉历程，活龙活现地展示出先辈们为开创新中国的金融事业艰苦创业的英雄风范。

1928 年初，周逸群、贺龙受中共中央委派来到湘鄂西地区，组织了以周逸群、贺龙、万涛等为领导的湘鄂西党组织。他们根据中央的部署，以湘鄂西地区优越的地理条件、丰富的物产资源为依托；以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饱尝了军阀连年混战之苦，又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广大劳动群众为深厚基础；以经受了大革命战斗洗礼的工农骨干分子和转入地下坚持斗争的共产党、青年团组织为基本力量，领导湘鄂西地区各级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创建了包括湘鄂两省西部、鄂北、鄂西北、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亦称湘鄂西苏区）。它以湖北的洪湖地区为中心，由洪湖、湘鄂边、巴兴归、鄂北、鄂西北、荆当远、枝宜、洞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庭湖特区等苏区组成。这一带既有一望无际的江汉平原和八百里洞庭湖区，又有连绵的丘陵和巍峨险要的武陵山脉。东下可握湘鄂中部,威慑武汉 南渡可入洞庭进逼湘、资 西上乃入川孔道 北进胁陕西,是进可攻,退可守,供生息求发展的大好河山，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形成互为犄角之势，相互策应，震慑敌人，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在创建过程中，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发展苏区经济,稳定苏区金融,支持军事斗争,从 1930 年初到 1931 年末，先后建立了监利县苏维埃金融机构、沔阳县苏维埃金融机构、石首农业银行、鄂西农民银行、监利县农民银行、鹤峰县苏维埃银行、鄂北农民银行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西特区分行。这些银行和政府所设金融职能部门都发行了自己的货币。由于受当时的客观环境和主观条件的制约，苏区货币金融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在根据地存在的 7 年中,大体可分为 4 个阶段。

第一阶段：沿袭使用旧币的阶段。 1928 年至 1930 年初，湘鄂西地区的党组织和红军主要是从事建立和扩大红军及地方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和健全苏维埃政权，进行土地革命。根据地内虽然基本摧毁了地主阶级、土豪劣绅的政权及其武装力量，但外有强敌压境，内则百废待兴，尚不具备建立银行、发行货币的物质基础。新生的苏维埃政府不可能立即拿出自己的货币代替旧币；而人民生产、生活及商品贸易都离不开货币；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急需向根

据地内外购买枪支、医药、粮食及其他生活必需品 农民、本地与外来的商人都持有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手段；各地政府没收地主、豪绅、反动商贾的资财“飞条子”“打洋船”等收入，多为旧币及金银；加上习惯势力的影响，所以根据地初创时期仍以银元、铜元、官票作为交换手段。沿袭使用旧币，既维护了农民和商人的利益，避免了苏区经济陷入困难，也为苏区准备建立银行和发行货币提供了时间和条件。

第二阶段：分散发行货币的阶段。1930 年 3 月至 1930 年 10 月，根据地开始巩固、发展，相继成立了各级苏维埃政府。为了抵制杂钞、劣币，占领苏区金融市场，监利县苏维埃政府和沔阳县苏维埃政府筹委会于 1930 年 3 月左右率先发行了自己的货币(信用券)。其间，有些区、乡苏维埃政府也发行了货币。不久，石首县农业银行和鹤峰县苏维埃银行成立并开始发行货币。 4 月，鄂西的江陵、石首、监利、沔阳、潜江五县联县政府成立，拟逐步统一洪湖苏区范围内的货币，于是建立了鄂西农民银行。这些银行所发行的货币都只在局部地区流通，所以具有流通区域小、发行量小、灵活性强等特点。这是根据地由沿袭使用旧币向发行自己货币转化的开端。但是，当时一些金融干部不了解发行纸币必须要以货币准备金作保证，出现了随意印制和发行的情况“当时区乡都发行了票子，用手写，盖个章就行了”[①]。可见当时的货币发行是很分散的，而且，随意性较强。

① 原鹤峰县苏维埃政府五里区金融委员曾传新回忆

分散发行货币是与当时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紧密相联的。红军开创根据地期间“分散暴动,打游击”“经济来源是打土豪，分田地，其中大部分分给贫苦农民，留了一部分作为供给来源”。[①]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逐步扩大，红军队伍人数的增加，所需经费开支越来越多。在国民党政府残酷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情况下，单纯依靠打土豪、劣绅所得是不够的，需要发行货币。当时，革命战争发展的总形势是敌强我弱，敌人多占有交通方便、经济发达的城镇，湘鄂西根据地都是由小块根据地逐渐扩大的，有的小块根据地之间相距数百里，如洪湖苏区与湘鄂边苏区等。各块根据地之间尚未建立统一的行政领导，不可能建立一个统一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只能依靠自力更生，自筹自给的方法解决，货币发行也只能采取各苏区自行制造与发行。这种分散发行的货币体系是革命进程的必然阶段，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对敌斗争和保护自己。即使一个地区暂时被敌人侵占了，也可避免敌人运用在这个占领区夺得的货币到其他根据地掠夺性地购买大量物资。当然，分散发行货币也有其弊端，主要是不利于对金融市场的管理。由于“各自为政的乱发纸币,结果惹起群众厌恶”。

第三阶段：集中发行货币阶段。1930 年 10 月湘鄂西联县政府成立至 1931 年夏。湘鄂西联县政府成立后,湘鄂西根据地已扩大到以洪湖为中心的 20 余县,纵横千余里，

① 原湘鄂西省委书记杨光华回忆

加上湘鄂边和巴兴归苏区及大片游击区，已具备了集中发行货币的主、客观条件。湘鄂西联县政府总结了前段分散发行货币的利弊，决定仍以鄂西农民银行名义发行货币，流通范围扩大至洪湖苏区及周围的苏区，原监利县农民银行、沔阳县苏维埃政府金融机构、石首农业银行停止发行货币，从而基本统一了洪湖革命根据地及周围苏区内的货币金融市场。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货币由分散发行到集中发行，一是有利于苏区经济独立自主，排挤各种形式的杂币，加强货币管理，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和商品流通。二是可以开辟更多的财源。《湘鄂西省委关于苏维埃工作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过去因省财政无源(各县同样),而开支又浩繁(购买粮食、衣被、医药等给养、军事设备、救济被压迫的群众及交通员费用等开支)”；“每月开支达 15 万元”,通过集中发行货币，控制金融市场予以弥补解决。三是利于治理发行货币过乱的现象，控制各地区乱发纸币，集中发行货币从客观上能够较好地控制货币发行量。一旦纸币发行量超过市场需要量，能够采取有效措施治理货币金融市场，也利于统一苏区币制。

第四阶段：货币发行失控阶段。1931 年初夏至 1932 年初夏，蒋介石派重兵围攻苏区，军政费用增多，加上长江中下游发生数十年未遇的水灾，湘鄂西苏维埃政府所设银行的有限资金既要用于军事，又要救济灾民和帮助农民恢复生产,苏维埃政府财政收入窘迫,致使货币发行量越来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多,后来发展到发行量失控。这个期间的 1931 年 11 月,湘鄂西特区分行成立，并开始以自己的名义发行货币。据《湘鄂西省委关于苏维埃工作给中央的报告》记载，当时“靠出纸币,以至出到 130 万元之多”,货币严重贬值,纸币兑不到现金(即银元)。货币‘超出市面需要。农产品缺乏,群众拿着纸票买不到东西”。甚至出现 1 元钱只相当于 1 角钱购买力的现象。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作出了决定：暂停发行纸币，收回已经多发的纸币。经过种种努力，包括动员机关党员、团员把多余的纸币无偿地捐献出来。这样先后收回了贬值的货币 60 万元，使币值有所回升。

1932 年夏,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该根据地的全面贯彻，第四次反“围剿”失利。10 月中旬，洪湖苏区丧失,1933 年秋，湘鄂边苏区再次丧失，湘鄂西地区党和红军被迫转移，湘鄂西苏区发行的货币，也被迫退出流通领域。

湘鄂西根据地货币和其他根据地货币相比较，有不少共同之处，它们都是革命时代的产物，都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但也有自己的特点,纵观之,主要有：

第一，货币本质职能与革命的时代性、宣传性相统一。湘鄂西根据地货币，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是工农武装割据的产物。它既是商品生产和交换中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具有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又是革命斗争的宣传工具。这种货币在票面上突出地反映出革命

时代的特色，融革命宣传、革命文化于货币之中，成为宣传党的纲领、方针、政策，唤起民众参加革命斗争的工具。如纸币票面印制了“党的十大政纲”“即“十大革命要求””“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等口号和镰刀、斧头、锤子图案，银币上铸有马克思、列宁的头像等。使党的指导思想、纲领和革命目标深入人心。同时，在不同形势下印制的不同文字、口号等，反映了革命斗争阶段性的要求，如石首农业银行一元券的正面四角是“夺”“取”“政”“权”四字，下边文字是“扩大赤色区域”“实行武装暴动”。鄂西农民银行早期信用券背面印有“武装保护苏联”“打倒帝国主义”“消除军阀混战”“扫除封建势力”的革命口号，还有《信用券条例》全文，标明这时苏维埃政权已趋向稳定，赤色区域初具规模。再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西特区分行货币上印有“冲破敌人经济封锁”“实现苏维埃政纲”，这反映了根据地处在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恶劣环境中，根据地人民行动起来，在开展军事斗争的同时，积极开展经济斗争，冲破敌人经济封锁，搞好苏区经济建设。除此，将信用券条例印于纸币背面、水利借券条例印制在水利借券上，使群众都能知晓货币政策、借券的规定，便于监督发行部门及时兑现，充分反映了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维护群众利益，维护苏区货币的信誉。

第二，独立性和人民性。根据地的货币，不依附于帝国主义列强，不受其操纵与控制，也不受国民党政府货币体系所制约，而是工农民主政权领导下的银行独立自主发

行的货币。其目的是为人民谋利益，为革命战争服务。正如《湘鄂西苏维埃》社论指出的“只要有益于群众的，都须马上坚决的着手进行”，“办理银行”等经济工作“对于整个苏维埃区域有伟大作用和严重意义的。那么，我们更应当毫不怀疑的执行……”。[①]

第三，有一定的准备金作保证，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得到了苏区人民的支持和信任。湘鄂西党和苏维埃政府在关于经济和财政问题决议案及有关文件、货币条例中规定：湘鄂西苏区所建银行、印制货币是以红军作战缴获的硬币、外币和金银交银行储藏；以政府税收（土地税、营业税、关税（含海关税））、富农特捐及累进税为担保；以苏维埃政府所收之公益费为担保品等作为储备基金，以保证币值的稳定。同时，还规定：随时兑现，在群众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较高的信誉。但是，整个苏区处于反动政权包围之下，其币值不仅受货币流通的自身特殊规律所制约，而且还要受军事斗争形势、政权的巩固与否等方面的因素所影响。

第四，区域性。湘鄂西根据地是由以洪湖苏区为中心的数块根据地组成的，因此，根据地内各片苏区相距不一，有的彼此相联，有的相距数百里，如湘鄂边苏区、鄂西北苏区之间及他们与洪湖苏区之间，都相距甚远，其间

① 《苏维埃区域的经济问题》补天 1930 年 12 月 7 日《湘鄂西苏维埃》第十期

还有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中心城市，使货币发行难以统一，因而虽建立了统一的“湘鄂西特区分行”，也无法使用统一的货币。为适应这种情况，鹤峰县苏维埃银行、鄂北农民银行都另行印铸和发行了自己所辖区内流通的货币。

湘鄂西根据地货币是革命进程中的产物，同时又是革命的重要工具，它一经产生，便运用其作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对根据地的各个方面产生着广泛的影响，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第一，稳定苏区金融，巩固了苏维埃政权。苏区建立后，国民党政府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富商巨贾及投机商用各种手法控制现金，致使市场上货币混乱，人心不稳。党和苏维埃政府没收了当地国民党银行和反动资本家资本，宣布废除一切高利贷和典当业后，发行了自己的货币，逐步制定并实施了苏区内和赤白区物资交流的正确政策，打击了劣币杂钞，活跃了苏区金融。苏区货币的集中发行，使币值信誉日渐提高，连邻近的国民党区域的商人来苏区进行商贸活动，也乐意使用苏区货币，促进了赤白区商品交换，商品市场日趋活跃，从金融方面保证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稳固和发展。

第二，促进了根据地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苏维埃政府建立后，没收了反动统治阶级控制的资财，进行土地改革，解放了广大农村和部分城镇生产力，根据地各银行通过发行货币对生产和经营企业提供低息贷款，支持发展生产。1931年春夏之季，湘鄂西中央分局和苏维埃政府为

发展农业生产，指示银行在已对农业生产提供了低息贷款的情况下，“再增加 1 万元”,[①]为农民解决了资金困难，扩大了耕种面积。群众自己联合组织的生产合作和消费合作社，都因得到银行的低息贷款而发展了生产和经营。1931 年大水以前，湘鄂西根据地尤其是洪湖苏区，生产事业蒸蒸日上，市场物资供应较为丰富，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根据地银行与货币在其中无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三，筹集资金，支援革命战争。在根据地开创时期，红军的给养主要靠自筹解决。根据地形成之后，红军负有保卫与扩大苏区之责，不可能再自筹给养。早在 1929 年 12 月，中共鄂西“二大”就决定“红军的经费由苏维埃政府发给，在未成立苏维埃的地方，则由农民协会担任”。[②] 1930 年以后，根据地各级苏维埃政府普遍成立，红军军费从此主要由苏维埃政府承担。

1930 年春，贺龙率红二军（原称红四军）奉命东下洪湖时，鹤峰县苏维埃政府通过发行借券，为红二军顺利东下筹集资金，作出了贡献。红二军团组成后，洪湖地区红军兵力增至 1 万余人。另外，洪湖地区还创办了红军医院，红军被服厂、兵工厂等军事后勤单位。红二军团及其

① 《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土地问题及反富农斗争的决议》，1931 年 5 月 14 日

② 《中共鄂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经济问题决议案》，1929 年 12 月

他军事单位所需的经费非常庞大，红军指战员的生活费一个月约 10 万元（原红六军的供给标准，每人每月伙食加零用约 10 元）。连红军医院的药费也“每月至少需 2 万元”。[①]而在根据地（主要指洪湖苏区）的鼎盛时期，湘鄂西联县（省）苏维埃政府的关税、营业税（即工、商营业税，农业累进税很少）收入每月大约只有 2 万元，其余收入“均由摊派、打土豪、打船等来源”[②]，其数量也不会很大。可以肯定，苏维埃政府的财政收入，远不能满足军事经费的需要，因而只有靠银行作财政发行来弥补。根据地银行除了发行一部分纸币来为军队筹集一般给养外，还要筹集一部分现金用于进口一部分军队急需的物品，其中药品及医疗器械最多。

以增发纸币来解决军费不足，虽然不是一个好办法，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一种有效手段，它对于根据地保存一支较大规模的红军及粉碎国民党军的三次“围剿”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扶贫济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根据地形成后，苏维埃政府一方面严格禁止高利贷，另一方面设立农民银行，发行货币，逐步取缔各色市票。根据地银行通过发行货币和向贫苦群众提供低息贷款，来免除他们遭受市票不兑现或银行钱庄倒闭所带来的损失以及高利贷盘剥的痛苦。由于有了低利借贷，广大人民群众发展了生产和经

① ② 《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形的报告》，1932年 12 月 19 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营，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特别是根据地银行大力支持苏维埃商店和群众自己组织的消费合作社，使人民群众能买到比较便宜的生活必需品。另外，苏维埃政府还十分重视对受灾或避难群众的救济，不少遭受灾难的群众，因此不再象过去那样逃荒要饭。

1931 年夏，苏维埃政府及时领导洪湖苏区群众与特大水灾斗争，并向受灾群众提供力所能及的救济。洪水退后，苏维埃政府立即贷款帮助受灾群众购买种子、农具，尽快恢复生产。为了预防和减轻可能继续出现的水灾，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还发行了 30 万元水利借券，主要向白区商人、富农及其他热心水利的人士推销，以帮助人民群众筹集修堤资金。湘鄂西省委还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从每月财政总收入中抽出 30%作为修堤费用。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湘鄂西苏区首次运用货币、金融的手段进行大规模水利建设，极大地坚定了根据地人民群众抗灾自救的信心。数万民工经过半年的努力，修复了水灾冲毁的长江及汉江堤坝，还修筑了一些垸堤、剅闸、河坝，疏通了一些河道，加强了根据地内部分地区的防洪能力。

湘鄂西根据地货币的上述作用，有时发挥得比较突出，有时则表现得比较微弱，这和根据地形势变化及币值是否稳定有关。本来，根据地货币对于发展经济的作用应该发挥得更充分一些，但由于根据地形势不够稳定，削弱了货币在经济建设中应有的作用。

湘鄂西根据地在白色政权包围和经济封锁的特殊环境

中，建立了人民自己的银行，发行了货币，总体来看是成功的，在苏区的巩固与发展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虽然遇到过挫折，但为后来的金融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有益的教训。

首先，根据地金融体系的建立与货币的发行，充分证实了在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夺取并建立政权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稳定民心，恢复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这就必须在没收帝国主义的一切资本和银行，扫除维护旧政权的豪绅地主军阀官僚的企业股本及银行，废除高利贷的盘剥的同时，建立自己的金融机构，以自己的货币控制金融市场，稳定金融。

第二，必须统一货币发行权。根据地初创时期，部分县苏维埃政府为了发展苏区经济，占领金融市场，曾各自为政发行货币。由于没有较充足的发行准备基金或物质作储备，以致出现发行紊乱，群众颇有意见。鄂西农民银行成立后，统一了货币发行，由于基金比较充足，纸币可以随时兑现，人民群众“非常信赖”。但由于根据地扩大，红军及脱产的机关工作人员增多，战事频繁，财政开支日益庞大，而财政收入还无大量而稳定的来源，为了解决财政赤字，“以致纸票的发行超过币面的需要”，[①]而银行又无法兑现，造成纸币币值剧跌，苏维埃政府和银行虽采取措施极力扭转这一局面，但在群众中已产生了不良的影

① 《中共湘鄂西省委报告》 1932 年 2月 25 日

响.

第三，维护货币、金融工作的独立性，是货币正常发行，币值稳定的重要保证。和当时其他根据地一样，湘鄂西根据地银行也归财政部门管辖，这样，货币发行就很容易为财政工作左右。在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货币作适量的财政发行是必要的，但必须十分谨慎而节制，决不可随便在银行支取。

中共湘鄂西特委第一次紧急会议决定“政府不得在银行提款，万不得已时，也只能借后加息偿还。”这一决定在湘鄂西农民银行初期是做到了，但因为银行受政府财政部门管辖，货币发行工作不久又受到财政工作的干扰。1931 年夏天以后，由于苏维埃政府处于极端困难时期，政府财政状况恶化，货币发行工作又一次被迫向财政开口子，结果便导致纸币发行失控。货币、金融工作不独立，货币的经济发行原则不可能得到严格遵循。

湘鄂西根据地货币在其短短的三年历史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或失败的教训，但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是宝贵的。任何新生事物的产生、发展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金融的发展，正是建立在总结包括湘鄂西根据地在内的各革命根据地货币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

第一章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概况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是广大军民在湘鄂西党组织领导下，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武装斗争逐步建立的。它无论是在动摇和打击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解除广大人民的疾苦，给人民指明求解放的方向方面，还是在平原湖区创建革命根据地，走具有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方面，都积累了经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毛泽东指出：“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①

第一节　根据地建立前夕的社会状况

一、政治形势

湘鄂西地区人民自近代以来，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421 页，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二版

从中国共产党创立到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在这个地区建立了党和青年团组织，领导了当地的工农革命运动。北伐战争中，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转战湘鄂西一带，播下了革命种子。这期间，这里的工农群众开展的革命斗争，形成了势不可挡的革命洪流。

1927 年秋大革命失败后，湘鄂西地区广大劳动人民和全国一样，陷入了豪绅地主、军阀、帝国主义的统治中，湖南的何健，湖北的胡宗铎、陶钧控制了两湖的军政等要害部门。军阀杨森部进犯鄂西，入驻宜昌，国民党刘佐龙的十五军、鲁涤平的二军、李品仙的八军和李焱的四十二军等先后进驻湘鄂西各地。他们与各县反动势力勾结，释放被农民协会扣押的土豪劣绅，解散了国共合作期间组织的国民党县党部，成立“国民党改组委员会”，厉行“清共”；捣毁各地工会、农民协会，解散农民自卫武装，成立各级“清乡委员会”，组织“保卫团”、“常练队”等反动地方武装，恢复各地县、区、乡的反动政权，加强保甲制度；进驻各地的国民党军队公开与土匪勾结，镇压革命运动，在江陵、石首、 沔阳 、公安、监利、华容、南县等地，组织暗杀队或还乡团、铲共队等，提出“招来天下刀客，杀尽共产党人”的口号，残酷捕杀共产党员、农协领导人、农民群众、工会骨干，并株连他们的家属。湘鄂西地区党组织被破坏，农会、工会被强令解散，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白色恐怖中先后壮烈牺牲。一些不坚定分子消极悲观，声明退党，有极少数人公开叛变，湘

鄂西革命运动转入低潮。

国民党新军阀在这个地区建立的反动统治，代表了和维护着在这个地区的帝国主义、买办势力，地主豪绅的利益。他们勾结在一起，对广大劳苦群众实行疯狂的军事镇压、政治迫害和经济剥削，使广大人民群众享受不到任何的民主权利，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挣扎在死亡线上。在湘鄂两省交界的西部地区的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劳动人民，还要遭受民族歧视、民族压迫，苦不堪言。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没有也根本不可能解决人民大众与地主豪绅、反动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是这个地区革命必然兴起和能够发展的社会根源，革命的高潮必然会到来。

坚定的共产党人，含悲隐恨，埋葬了同伴的尸体，擦干了身上的血迹，以更深的仇恨和强烈的革命责任感，转入地下，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开展秘密斗争，一些工农群众还在以不同形式进行反抗和斗争。南昌起义后，在党的指示下原起义部队二十军师长贺锦斋转回鄂西，积蓄着革命力量，在这片孕育革命的沃土上，努力开创革命的新局面。

二、社会经济

湘鄂西地区的劳苦大众勤劳、朴实、勇敢、聪慧。他们祖祖辈辈利用这里的纵横交错的江汉平原、洞庭湖区和山岳地带的自然条件辛勤耕耘，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